# 清乾隆时期仿古砚制作初探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Archaistic Ink-stones Produced during the Qianlong Emperor's Reign in Qing Dynasty

赵丽红

*Zhao Liho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7 Vol.18
故宫学刊
二〇一七年 总第十八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 清乾隆时期仿古砚制作初探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Archaistic Ink-stones Produced during the Qianlong Emperor's Reign in Qing Dynasty

赵丽红

Zhao Lihong

**内容提要：**

清乾隆时期内廷造办处有大量仿古砚的制作，其中有些是仿自《苏东坡砚谱》、或明代《高濂砚谱》，以及旧藏砚品，如各式仿古石砚、仿古澄泥砚、烧古铜匣暖砚等，大部分是有所本的画样仿做。不仅造型仿古，命名也仿古，还有以宋砚相称，实为本朝仿古砚形式。以往砚的研究尚未涉及仿古砚的制作。本文依据清代宫廷造办处档案，并结合现藏实物，对乾隆时期仿古砚的制作形式包括烧古、做旧或改做等做初步探究。

**关键词：**

乾隆　仿古砚　画样　烧古　做旧

**ABSTRACT:**

During the Qianlong Emperor's reig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Workshop of the Inner Court made a lot of archaistic ink-stones. Some of them were modeled after those mentioned in the Su Dongpo's *Record of Ink-stones*, some after the Gao Lian's *Record of Ink-stone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others after ink-stones in their collection, such as those made of stone, *chengni* clay, and copper, the latter being able to be heated with fire below. Most of them had sample drawings to follow. They are archaistic not only in form and design but also in name, some being called Song ink-stones but actually mad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archaistic ink-stone was not covered in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relying on files of the Imperial Workshop of the Qing court and the items in our collection, carried out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shaogu* (making artificial inclusions through firing), *zuojiu* (antique finishing), transformation and other producing methods of archaistic ink-stones during the Qianlong Emperor's reign.

**KEYWORDS:**

Qianlong, archaistic ink-stones, sample drawing, *shaogu*, *zuojiu*

乾隆时期宫廷御用砚的制作，一般是根据皇帝个人的喜好，由内廷造办处承办制作，或由内廷如意馆画师画样等。其中还有些是命地方制作或年例进贡等。其本人也有参与设计或审定，或将御题诗咏镌刻于砚，分别陈设于内府书斋，或于乾清宫入古上等珍藏，或著录《西清砚谱》等。特别是还命寻觅古砚佳材，将失传已久的唐宋澄泥砚仿制成功，其制作形式种类多样，不但注重实用，而且更具装饰艺术，呈现出独特的时代风格。

内廷造办处“砚作”、“金玉作”等均有大量仿古砚的制作，大部分是有所本的画样仿制。如各式仿古石砚、仿古澄泥砚、烧古铜匣暖砚等，既有仿自明代“高濂砚谱”，又有仿自“苏东坡砚谱”，或旧藏砚品等。特别是还有以六式成套制作的仿古砚形式，或造型仿古，或命名仿古。如仿汉、仿唐、仿宋等，并成为内廷定式。此外，还有一些烧古石砚、烧古暖砚或烧古作旧澄泥砚的制作。如端石烧古结绳砚、做旧黑石龙砚、澄泥虎符砚、澄泥石渠砚、澄泥龙砚、澄泥菱花式砚等，均为本朝新制的仿古砚形式。其中有些是由内廷画师画样，或由内廷造办处制作，或发往苏州按内廷样式承办制作。其澄泥原料不仅有取自山西绛县或汾水澄泥，而且还有加入宜兴澄泥，即命苏州“按加用三成宜兴澄泥之法”[1]混合原料制作。这些仿古砚，深得乾隆皇帝的青睐，成为御笔临池或各处行宫陈设或赏赐用砚等。

## 一　内廷造办处仿古砚的制作

乾隆时期，内廷各类器物均有仿前朝或仿古画样制作的情况。其中还有仿照宋砚谱画样制作的各式石砚、澄泥砚等。据记载，乾隆早期内廷如意馆为“做假古玩起稿”画样用纸多达数百余张。如乾隆七年如意馆记载：“做假古玩起稿用泾县榜纸六十张，棉榜纸六十张。”[2]由此可以推断，乾隆初年就有大量仿古器物的制作。虽然上述记载没有明确画样古玩器物的形式，但从早年的活计档案中发现有仿宋石砚的制作。其中有署本朝款，也有假托宋人名款等，即应是有所本的画样仿制。

### （一）内廷画样仿制

乾隆初年，内廷造办处砚作有多种仿古石砚的制作，其中有些是仿宋砚形式。如端石龙马负图古砚、五岳古砚、苏轼款砚等，应是有所本的画样仿制。据乾隆三年三月砚作记载：“初八日，崔总白世秀将画得纸样一张，五岳古砚纸样一张，交太监毛团高玉呈览，奉旨：准做龙马负图古砚一方，钦此。于本年八月十一日，司库刘山久将做得端石龙马负图古砚一方，交太监高玉呈进讫。”[3]由此可知，早在乾隆三年，内廷砚作已有仿古端石砚的制作，并有乾隆帝御题砚铭。见于《御制诗文二集》御题砚诗有以“宋端石龙马负图砚”相称。其诗文也镌刻于一件端石抄手砚〔图 1〕，现藏故宫博物院。砚面雕刻海水龙背洛书图砚池，边框上雕刻八卦图及海水纹。其形制古朴厚重，砚上镌刻乾隆帝御题砚铭为：“石刻砚殊非古也，怀铅椠事可举也，

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42 册，第 513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合编，人民出版社，2007 年。

2 同注 1，第 12 册，第 32 页。

3 同注 1，第 8 册，第 437 页。



图 1 清乾隆 仿宋端石龙马负图砚砚身及铭文

端之阮宋始者也，马负图挂之祖也，会为一典用数也，帝鸿纽或其伍也，谁其用莫之考也，慎丝纶则我所也。”与《御制诗文集》著录的“宋端石龙马负图砚”诗文相同。由此可见，乾隆帝也有将本朝新制的仿古端石砚以宋砚相称。上述记载中的画样新制端石砚应是乾隆早期仿宋砚形式。

此后，内廷造办处砚作仍有多种画样新制的仿古砚形式。如乾隆十三年二月砚作记载：“将画得钟式砚样一张，八卦砚样一张，夔凤砚样一张，长方夔龙砚样一张，七星砚样一张，长方半璧砚样一张，奉旨：照样准做，其砚向懋勤殿要，钦此。”[1] 其中所列砚式有六种，即钟式砚、八卦砚、夔凤砚、夔龙砚、七星砚、长方半璧砚。虽然尚未明确其材质，但从画样砚的名称、形制分析，也应是有所本的仿古砚形式。上述六种形式的石砚仍有少量传世，也成为乾隆早期御用砚特点。

## （二）仿苏轼砚谱画样新制

乾隆早期，内廷砚作还有按照“苏东坡砚谱”画样制作的仿宋砚形式。如仿苏轼绳式古砚、仿苏轼款八卦式砚，其砚上或镌刻“轼”字款等。其中有些是由内廷砚匠烧古或做旧，还有些是发往苏州制作并烧古或做旧等，为乾隆时期特有仿古砚形式。

### 1. 仿苏轼款八卦式砚

据乾隆七年九月砚作记载：“传旨：着将匣内照歙石砚盒磨做旧砚一方，其砚样在苏东坡砚谱上拣选一方，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本月二十三日……将画得古砚纸样六张，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八卦式古砚一件，得时砚台下刻一轼字，其盒做歙石砚盒一样成做。”[2] 其中明确说明准照“苏东坡砚谱”画样制作八卦式砚，并刻有“轼”字款。从中可知，其砚及砚盒材质应为歙石。即是由内廷画师画样，出自内廷砚匠之手。上述画样新制的八卦式砚现藏不详。至今，旧藏砚品中的确有镌刻“轼”字款、或“东坡居士”款砚，尚存质疑，其中或也是乾隆时期的仿古砚形式。

### 2. 仿东坡居士款结绳砚

仿制宋苏轼结绳砚并有烧古做旧的形式，也应是有所本的画样仿制。据乾隆七年砚作记载：“将做得绳式古砚一方，并本文一张持进……奉旨：此砚上斑点红绿太多，还像新的，将红绿去些，照交出古砚做。”

1 同 177 页注 1，第 16 册，第 152 页。

2 同 177 页注 1，第 10 册，第 764 页。



图 2 清乾隆 仿苏轼款结绳古砚

其中记述新做绳式古砚烧古做旧色。“于四月二十七日……将收拾得绳式古砚一方持进……奉旨：将砚留下，其砚上烧的古不好矣，顾继臣来时再将此砚讨出另烧古。”从中可知，绳式古砚是由内廷砚匠顾继臣烧古做旧而成。此后又有记载：“再做古砚一方……做篆字向氏墨林收藏字样，下做银丝镶嵌图书，钦此。于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将改古砚木样一件持进，交高玉呈览，奉旨：准做绳式砚，将赋刻在砚底下，做得时在边墙上写一轼字，呈览，准时再烧古砚，其紫檀木砚匣做素的，不必雕做，用银丝将项子京家珍藏字样嵌在盒盖内。”[1] 其中详细记述了内廷砚作仿制苏轼款绳式古砚的过程。此砚见于乾隆《钦定西清砚谱》卷八著录，命名为：宋苏轼结绳砚。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图 2〕，砚表面有明显的铜绿锈色，为烧古做旧痕迹。背面镌刻苏轼砚铭，并署“东坡居士识”款，盒内有银丝镶嵌“项氏墨林收藏”印，与上述活计档案记载相符，即是乾隆时期内廷造办处画样新制的仿古砚形式。

## （三）仿旧砚画样新制

除上述有所本的画样仿制外，还有一些是仿照内廷旧藏器物画样制作，如仿“汉玉虎符砚盒盖”画样，仿旧藏龙德膺符石砚等制作，其砚上或还有镌刻“淡氏收藏”款字样。除砚作外，金玉作也有负责仿古砚的制作，成为乾隆时期特有的仿古砚形式。

### 1. 仿汉虎符砚

乾隆早期，内廷造办处还命砚匠顾继臣仿照汉玉虎符砚盒盖制作仿古端石虎符砚。如乾隆九年正月记事录记载：“将汉玉虎符砚盒盖等活计持进，交太监胡世杰等，呈览，奉旨：将汉玉虎符砚盒盖，着顾继臣用端石做古砚一方，上刻淡氏收藏，系何字样查明，再刻，钦此。……于三月十四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虎符砚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砚台用好好端石的，古砚得时入多宝格，将现做古砚换出，钦此。于四月二十八日，将做得好端石古砚，入多宝格讫。”[2] 其中记述乾隆九年，还制作有仿古端石虎符砚，并出自内廷砚匠顾继臣之手，砚上还镌刻“淡氏收藏”字样（推测或是项氏收藏）。今天虽然尚不见汉玉虎符砚，也不见有端石虎符砚传世，而是有澄泥虎符砚传世，但这些澄泥虎符砚也应是乾隆本朝所制的仿古砚形式。

### 2. 仿旧龙德膺符砚

乾隆时期，内廷造办处金玉作也有仿古砚的制作。据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金玉作记载：“初五日……交龙德膺符旧砚一方（随旧漆砚盒），旧石长方砚大小二方，传旨：将长方砚二方，照龙德膺符旧石砚样款、花纹做法一样改做二方。先估料呈览，钦此。随将长方石砚二方，照龙德膺符旧石砚一样料估，长宽足用，

1 同 177 页注 1，第 10册，第 765 页。

2 同 177 页注 1，第 12 册，第 259 页。



**图 3 清乾隆 仿宋宣和梁苑雕龙砚**

厚里下薄二分，画得粉道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砚盒亦照漆砚盒一样，用紫檀木成做。”[1] 从中记述又有仿照旧藏龙德膺符砚画样制作二方石砚。其后，乾隆帝还命将砚池照原样做得要深要大些：“于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将做得未完龙德膺符砚二方，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砚池依口下深一分，往宽大里开做。”由此可知，照样仿做的两方石砚形制相同，其砚池较大。造办处即于本年九月将“龙德膺符砚二方，各配得嵌玉一块紫檀木砚盒盛装……奉旨：著在养心殿安设一方，养性殿安设一方”[2]。记述后仿做的两方石砚各配得嵌白玉（螭虎）紫檀木盒，分别陈设在养心殿、养性殿。

由上可知，乾隆时期的确有旧藏一方龙德膺符砚，并与乾隆《西清砚谱》卷七著录的龙德膺符旧石砚（旧藏养性殿）记载相符，此砚现藏不详。而后照旧砚仿做有二方，其中一方传世，并见于《西清砚谱》附录（卷二十三）著录，命名为：仿宋宣和梁苑雕龙砚〔图 3〕，现藏故宫博物院。其砚内附黄纸签墨书：“仿宋宣和梁苑雕龙砚入谱附录。”其材质为紫端石，并镌刻御题砚铭：“琢蜿蜒含氤氲，龙德符昭其文。髣乎鬯阐旧闻，游天池蒸墨云。乾隆乙未御制。”并篆书“乾”、“隆”二印。背面镌刻“大清乾隆仿制”。嵌玉紫檀木匣上镌刻诗文与砚同。此砚即是乾隆时期仿旧砚制作的仿古砚形式。

## （四）旧石砚改做

乾隆时期的仿古砚，还有些是将内府旧藏石砚进行改做，并将乾隆帝御题砚铭镌刻于砚，或磨去旧砚上的名款，或后加款识等。如宋陆游素心石砚、子昂款旧石砚等，即是有砚池的改做或刮磨的情况。

### 1. 仿宋陆游素心砚

乾隆《钦定西清砚谱》著录的一件宋陆游素心端石砚（旧藏御兰芬），砚额上刻“乾隆御玩”四字，应为乾隆皇帝鉴藏用砚。其砚池经过了深雕改做，并后配嵌玉紫檀木罩盖匣。即应是乾隆时期改造的仿古砚形式。如乾隆四十年正月广木作记载：“于二月十六日，将素心砚一方，配得紫檀木罩盖匣一件，拟将太极石砚匣上皮糙玉腰元五毒镶嵌一块在此匣盖上嵌安。”记述其中一方素心砚配得紫檀木罩盖匣珍藏。其后又见于记载称：“将端砚一方，画得砚池往大里开，宽一寸，落深五分，贴得乾隆御玩款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水池准照粉道开宽，其款亦准交如意馆刻。”详细记述了“乾隆御玩”款端石素心砚的砚池是经过改做，

1 同 177 页注 1，第 37 册，第 647 页。

2 同 177 页注 1，第 37 册，第 649 页。



图 4　清乾隆帝　御铭款石各式仿古砚

其后加款是交由如意馆刻字完成。此砚现藏不详。而从《西清砚谱》卷九著录砚分析，砚上镌刻“乾隆御玩”的素心砚仅此一方。由此可以推测，乾隆四十年内廷砚作还有多次改做旧石砚的情况。

**2. 仿子昂款砚**

内廷造办处除砚作外，还有一些旧石砚改做是交由金玉作完成，其中也有改做砚池，或后刻名款的形式。如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金玉作记载：“石砚一方，上画改做粉道，传旨：着照粉道改做。钦此。于正月初七日，库掌四德五德笔帖式福庆，将石砚一方按粉道改做未完随完活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水池用矿铜石补做，如无即着造办处想法补做，得时交杨大章另添画水池。”其中记述一件石砚的改做情况。其后，又记载称：“奉旨：砚上水池准用黄铜山子补做，再按红道另池并添做竹节、竹叶，其砚墙上现刻至正年款，赵子昂姓名俱各磨去。”[1] 从中可知，改做的石砚是将砚上的“至正年”款，或“赵子昂”名款，俱各磨去。由此可以推断，当年或还有仿刻至正年款，或赵子昂（赵孟頫）款石砚的制作。无论是将旧藏石砚上的字磨去，还是将新刻石砚上的字磨去，从记述磨去“现刻至正年款”分析，很有可能是将后刻款字磨去，也应是仿古砚形式。正如乾隆《西清砚谱》著录序所述：“其弃置库中为之剪拂刮磨，罅为奇品者若干枚”记述有多方砚是后改做而成。

## （五）仿自高濂砚谱

乾隆时期，内廷“砚作”所制各式仿古砚，不仅造型仿古，砚的命名也仿古，或仿汉，或仿唐，或仿宋等，大部分是有所本的画样仿制。正如御题旧端石海日初升砚云：“海天初月未央之砖，高濂砚谱仿以向年。（注：砚谱有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曾命制澄泥以仿之）”其中记述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除端石砚的制作外，还有澄泥砚的形式等，均仿自高濂砚谱，即是有所本的画样仿制。如“高濂砚谱”集录（宋）高似孙“砚笺”中的砚式多达四十余种。一般以造型命名有：凤池砚、蓬莱砚、圭砚、辟雍砚、曲水砚、八稜砚、四直砚、东坡砚、葫芦砚、双履砚、月池砚、方池砚、斧形砚、琴砚、太极砚、箕砚等。其中还有少量的图绘砚式，如兴和砖砚、绿端石砚、洮河绿石砚、天成七星砚、未央宫砖头砚、石渠阁瓦砚、八稜澄泥砚、天成风字砚、玉兔朝元砚、德寿殿犀纹砚等，均有以此为蓝本仿制，或多件成套制作，成为乾隆时期特有的御用砚形式。

这些成套制作的各式仿古砚，即是由内廷如意馆画师画样，并由内廷翰林拟字或御题砚铭。分别命名有：仿汉石渠阁瓦砚、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天成风字砚、仿宋德寿殿犀纹砚六种。乾隆皇帝曾有多次御题诗咏，并分别将御题砚铭镌刻于砚及砚盒。每件砚品或配以嵌玉木盒或漆木盒等，共装于紫檀木盒，其装潢考究。至今，这些成套制作的各式仿古砚〔图 4〕仍有大量传世，其

1　同 177 页注 1，第 36 册，第 464 页。

材质有端石、歙石、澄泥、紫石四种，其制作形式以及命名相同，均为乾隆时期仿古砚形式。

## 二　仿古砚的烧古做旧

乾隆时期，内廷砚作所制各式仿古砚，不仅有按照砚谱画样新制，而且还有将新作端石砚、澄泥砚等烧古或做旧青绿色，或仿古做旧的情况。如新做绳式古砚，即仿宋苏轼结绳砚，为烧古做旧而成。这些砚经过了改做或做旧，成为乾隆时期特有的仿古砚形式。

### （一）内廷烧古做旧石砚

**1. 烧古做旧端石绳式砚**

据乾隆八年六月砚作记载："古砚一方，新做绳式古砚一方，随匣，系多宝格内，传旨：新做绳式古砚不像，着顾继臣照从前烧过古砚一样烧造。"[1] 从中可知，新做绳式古砚是由来自苏州的内廷砚匠顾继臣烧古做旧而成。

不仅如此，内廷砚匠顾继臣善于砚的烧古做旧，其子也命进京学做旧砚。如乾隆十年苏州行文记载："初八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青绿驼洗一件，随紫檀木座木盖样，传旨：着交苏州织造安宁图拉令顾继臣照木盖样，用好端石做砚一方，刻阴文字做旧，着伊子顾耀宗亦学着做旧，到京时好做旧砚。"[2] 其中记述命来自苏州的砚匠顾继臣作旧端石砚，其子顾耀宗亦进京学做旧砚，供奉内廷。顾继臣是雍正初年由苏州织造招募选派入宫的牙匠。雍正时期常住圆明园当差，擅长牙雕、砚雕的制作。乾隆时期顾继臣又入养心殿造办处，不仅参与了松花石砚的制作，还有负责仿古瓦砚的改做或仿古砚的烧古做旧等。

**2. 做旧黄石砚**

据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广木作记载："黄石长方砚一方（畅春园撤下）……砚墙上花纹并砚底字磨去，四角兽面贴得收小纸样持进……奉旨：先将兽面照样改做一个呈览，将边上缺处照石渠澄泥砚青绿古色一样做古色遮盖。"[3] 从中可知，此件黄石砚是经过了改做后，又做旧青绿色，也是乾隆时期特有的做旧仿古石砚形式。

**3. 做旧黑石龙砚**

此外，还有命内廷牙匠黄兆做旧新制石砚的情况。如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广木作记载："黑石龙砚一方，砚底上刻诗，系新做仿旧，传旨：着配砚盒先呈样，钦此。"又"于六月初六日……将砚交如意馆着黄兆收拾颜色"[4]。其中记述新作黑石龙砚是由内廷牙匠黄兆收拾做旧颜色，为乾隆时期仿古做旧砚形式。

黄兆是于乾隆十四年来自广东粤海关监督招募的牙匠（时年 26 岁入宫），因其手艺好，并擅长雕刻人物，深得乾隆帝的赏识，封为八品牙匠，直至乾隆晚期仍供奉于内廷。乾隆五十年，时年六十二岁的黄兆应邀参

1　同 177 页注 1，第 11 册，第 592 页。
2　同注 177 页 1，第 13 册，第 719 页 。
3　同注 177 页 1，第 40 册，第 43 页。
4　同注 177 页 1，第 40 册，第 556 页。



图 5　清乾隆　御铭仿古款澄泥石渠砚

加了千叟宴。其后乾隆五十五年，仍有做旧竹雕如意的活计制作。由此可知，其人手艺高超，深得内廷信任，其不仅善于做旧牙雕、竹雕如意等作品，而且还参与了仿古石砚、澄泥砚的做旧。

## （二）内廷烧古做旧澄泥砚

### 1. 做旧澄泥龙砚

据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广木作记载："于五月二十二日，将新作澄泥龙砚一方上懋勤殿刻得诗持进……奉旨：龙砚交黄兆收拾旧……配得雕龙砚盒样持进……其砚台交懋勤殿使用。"[1] 从中可知，新做澄泥龙砚是由内廷工匠黄兆做旧而成，为乾隆时期特有的仿古澄泥砚形式。

### 2. 做旧澄泥石渠砚

乾隆时期内廷造办处新做澄泥砚，也有因材质性软，或不合研用，命内廷砚匠方占吉加用瓷面重新毁烧或做旧，使砚更为坚硬莹润。如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广木作记载："将澄泥石渠砚一方呈览，随交出新澄泥一块，奉旨：着金（简）问砚匠澄泥照石渠砚坚硬并旧意颜色能做不能做，问明具奏。……随询问砚匠方占吉，据伊禀称：此澄泥性软，是新澄泥砚颜色旧意成做，用此澄泥加瓷面等毁造，经火可坚硬仿旧等。"[2] 其中记述内廷造办处砚匠不仅有将新制澄泥石渠砚做旧，而且还有在澄泥原料中加用瓷面烧造或毁造的情况，也可谓是乾隆时期澄泥砚原料的创新形式。此后，还有少量澄泥石渠砚是交苏州按内廷样式制作或作旧或刻款等，也有的是由内廷懋勤殿镌刻诗文等。至今，仍有多件大小澄泥石渠砚传世，表面有做旧绿色痕迹，砚体镌刻御题砚铭，以及署款"大清乾隆仿古"字样，或"乾隆御用"款，成为乾隆时期御用砚形式〔图 5〕。

### 3. 做旧澄泥菱花式砚

据记载，内廷造办处还有将新作澄泥菱花式砚仿古做旧的情况。如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广木作记载："将做得澄泥菱花式砚一方，交太监如意呈览。随交出菱花式古砚一方，正面嵌五铢钱一个，背面嵌五铢钱二个，随嵌玉刻字紫檀木砚（乾清宫）……奉旨：新做砚照古砚上颜色旧意样做旧。亦嵌安古钱，应用古钱向里边要用。"[3] 其中记述内廷新制的澄泥菱花式砚也有镶嵌古钱纹，并照样做旧颜色。也成为乾隆时期又一仿古砚形式。

由上可知，内廷造办处画样新制的仿古各式砚不仅样式仿古，而且还有烧古或做旧颜色。其中有来自苏州的砚匠顾继臣、顾耀宗父子，还有来自广东的内廷牙匠黄兆、（方占吉）等，均参与了仿古砚的制作，特别是顾继臣父子将苏州地方成熟的烧古做旧技术带入宫廷，制作有大量仿古砚，成为内廷御用砚的重要形式。

1　同 177 页注 1，第 39 册，第 678 页。
2　同 177 页注 1，第 39 册，第 699 页。
3　同 177 页注 1，第 40 册，第 536 页。

此外，还有一些旧砚发往苏州烧古或作旧等。

## （三）苏州烧古做旧砚

### 1. 做旧澄泥砚

乾隆时期，仿古澄泥砚制作，深受乾隆皇帝的青睐，特别是乾隆四十年以后，命寻觅古法制作。除上述成套制作的各式砚外，还有多种形式各异的仿古做旧澄泥砚。如乾隆四十二年行文记载："澄泥虎砚一方，随紫檀木包袱式盒一件，系苏州新做，传旨：着发往苏州交舒文，将菱花式砚、并长方石砚、照虎砚颜色一样做青绿色送来。于二十三日，侍郎金（简）将做得澄泥龙砚一方，八方砚一方，随菱花式砚一并交苏州，照虎伏砚一样做青绿旧色……"[1] 其中记述以苏州新做澄泥虎砚做样，将造办处新做澄泥菱花式砚、澄泥龙砚、八方砚、长方石砚发往苏州照虎砚颜色一样做旧青绿色。由此可知，当年发往苏州做旧澄泥砚的形式种类多样，其中还有做旧石砚的情况。

### 2. 做旧瓦砚

内廷珍藏有多件仿古瓦砚，成为乾隆皇帝的鉴赏砚品，其中有三件被视为入古上等，并珍藏于乾清宫，其中有的是经过了修补或改作，但仍然视为古砚，并分别配以嵌玉紫檀木盒珍藏。还有的瓦砚是命苏州修补并配做"古陶三友"红雕漆龙凤纹匣盛装。据乾隆三十九年行文记载："交瓦砚一方，传旨：苏州将砚底二角足上缺处补好，照样随随色，其砚面刻缺处俱不必收什，旧意亦不可去，钦此。于本月初六日将交苏州收什瓦砚一方，砚底懋勤殿贴得篆字本文持进呈览，奉旨：著交苏州照本文刻字，配文雅砚盒送来。于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将苏州送到瓦砚一方随砚盒交讫。"[2] 由上述记载分析可知：(1) 其中的一件旧意瓦砚是交苏州修补并随旧色。(2) 瓦砚的砚底刻字是交苏州按照内廷懋勤殿贴得篆字本文样式镌刻完成 (3) 文雅砚盒也是交苏州配制，即是按内廷要求制作完成。正如乾隆四十二年记载："传旨：着寄信催苏州织造舒文，现做"古陶三友"雕漆盒快做完送来。钦此……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将雕漆盒一件，内盛古砚三方，配得屉，安在养心殿，呈进讫。"[3] 详细记述了交由苏州为配装三方瓦砚制作红雕漆盒的过程，并陈设于养心殿。后又陈设于宁寿宫。由此可知，乾隆皇帝晚年仍对仿古瓦砚情有独钟，其陈设地点也是由乾清宫，后移至养心殿，又移至宁寿宫，即砚的陈设也随着乾隆皇帝早中晚期不同的居住地点发生着改变。至今，此三方瓦砚仍传于世，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 3. 烧古做旧铜匣暖砚

乾隆时期，御用暖砚一般多为仿古砚形式。除内廷造办处制作外，还有发往苏州烧古或做旧的情况。其中有仿宋风字形暖砚、其署名"乾隆仿古"、或仿宋"宣和御用"款。如乾隆三十八年金玉作记载："紫石长方砚一方，（随风字式花纹砚池纸样一张，砚盒墙子上花纹纸样二件，说帖一件。）传旨：将砚割开，按风字式花纹纸样成做砚二方，随铜台撒砚盒，盒墙子上亦照画样作花纹，先做样呈览，钦此。于四月二十五日，

1 同 177 页注 1，第 40 册，第 226 页。

2 同 177 页注 1，第 38 册，第 442 页。

3 同 177 页注 1，第 40 册，第 631 页。



图 6 清乾隆 仿古款铜镀金盒暖砚

库掌四德五德等将紫石砚一方，照交出风字式画纸样，做得砚台木样一件，随铜砚盒合牌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改做二方。一方背后刻宣和殿制造，配铜烧古砚盒。一方背后刻乾隆年仿造，配铜镀金砚盒。”[1] 其中记述了内廷造办处按照做得风字形砚台木样，改做二方紫石砚的情况，即是将紫石砚一分为二做成相同的风字形砚台。

此后，又命造办处按照砚盒木样配做二件仿古（洋錾）铜砚盒，并明确说明画样的装饰图案以及仿古款识等。如“于五月初六日，库掌五德笔帖式福庆将砚盒木样一件，墙子上贴得花纹样，并兽面环子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砚盒墙子上添画海螺、海马、鳖鱼、龟样，其兽面亦着收小，钦此。初七日，库掌五德笔帖式福庆将砚盒木样上另画得海螺、海马、鳖鱼、龟样，做得收小兽面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洋錾铜砚盒二件内，一件烧古刻宣和御用，一件镀金刻乾隆仿古，得时将烧古砚盒发往苏州烧古。”[2] 从中可知，一件是铜镀金砚盒，并刻“乾隆仿古”款，另一件为铜烧古砚盒，并刻“宣和御用”款，即是命发往苏州烧古而成。

由此可知，乾隆时期仿古暖砚的制作，不仅造型仿古，其落款形式也有仿古。如“宣和御用”款、“乾隆仿古”款，除内廷造办处所制外，也有发往苏州烧古或做旧暖砚形式。见于乾隆《西清砚谱》卷七著录的一件暖砚，镌刻“宣和御用”款，即应是发往苏州烧古制作而成，现藏不详。至今，仍有三件仿宋风字形铜匣暖砚，与上述记载的暖砚形式相似，现藏故宫博物院。其中的二件分别镌刻“乾隆仿古”款、“大清乾隆年制”款。〔图 6〕另一件无款，也应是乾隆时期的仿古暖砚形式。

## 三 苏州仿古澄泥砚的制作

乾隆时期，仿古澄泥砚的制作与乾隆皇帝本人的兴趣喜好有直接的关系。正如乾隆四十年御题诗咏称：“四十年始用澄泥习字”，并赞誉澄泥砚“汾水之泥，墨池之制，色古质润，体轻理致，比玉受墨，较石宜笔，临池虽助，书法实愧，更予戒哉，玩物丧志”。可谓推崇备至。从诗文分析可知，乾隆皇帝对澄泥砚情有独钟。这或许是命仿制澄泥砚的缘由，也成为山西、苏州研制并有大量澄泥砚制作的原因。乾隆皇帝亲自查阅文献书籍，得知南唐张洎《贾氏谭录》记载：“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随谕旨命山西巡抚巴彦三寻觅古法制作，一年后，山西巡抚将研制的澄泥原料陆续呈进。其后，山西、苏州等地，均有按照古法制作的澄泥砚，但因山西澄泥砚不合用，大部分澄泥原料是发往苏州制作。一般是由内廷画样，发蜡样、木样交由苏州织造按内廷样式承办制作。其中还有将澄泥砚发往苏州按照《古今图书集成》砚谱（或明代“高濂砚

1 同 177 页注 1，第 36 册，第 362 页。

2 同 177 页注 1，第 36 册，第 362 页。

谱”）画样改做“八棱澄泥砚”、“兴和砖砚”的情况。澄泥原料不仅有取自山西绛县或汾水澄泥，而且还有加入宜兴澄泥，即乾隆四十四年以后命苏州俱“按加用三成宜兴澄泥之法”[1]混合制作，应是苏州澄泥砚在原料方面的创新形式。如六式成套制作的澄泥砚、澄泥石渠砚、澄泥虎符砚等，其中大部分是有所本的画样仿制，极具时代特点。至今，这些各式仿古澄泥砚仍有大量传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或台北故宫博物院。

## （一）按内廷发样制作

### 1. 澄泥砚的改做

据记载，乾隆四十年八月，内廷造办处有将旧藏澄泥砚发往苏州按照《古今图书集成》砚谱画样改做“八棱澄泥砚”、“兴和砖砚”的情况。如乾隆四十年（八月初十日）油木作记载：“交嵌玉一块，紫檀木砚盒一件，内盛大号澄泥砚一方。嵌玉一块，紫檀木砚盒一件，内盛中号澄泥砚一方。嵌玉一块，紫檀木砚盒一件，内盛小号澄泥砚一方。《古今图书集成》砚谱书一本，传旨：俱交苏州，将大方砚一方照砚谱书上‘八棱澄泥砚’样料估改做二方。中号砚一方，照砚谱书上兴和砖砚样改做一方。小号砚一方收拾齐全，俱配文雅朴实砚盒，其旧砚盒做材料用。”从中记述交苏州按砚谱样式改做澄泥砚的情况。其后，又命“将兴和砖砚样上画得镶嵌古钱墨道，奉旨：俱准交苏州，用发去旧砚二方，照砚样改做四方，各照本文刻字，再将厚四分五厘兴和砖砚，按上面墨道向里边查要古钱一个，一并发往，照墨道分位嵌按”[2]。其中记述的镶嵌古钱纹兴和砖砚是内廷发料交由苏州按照砚谱画样改做，即是有所本的仿古砚形式。

### 2. 新作澄泥石渠砚

乾隆四十年以后，内廷造办处陆续将澄泥原料或砚样发往苏州制作，其中有多件仿古澄泥石渠砚。如乾隆四十二年九月行文记载：“将做得澄泥石渠砚一方……奉旨：着贴大清乾隆仿古款样呈览，准时发往苏州刻款，将砚做青绿色，研墨处不必上色，再将现发澄泥砚十块，除做玉兔朝元砚，余剩澄泥照石渠砚一样成做二方，周围放大一寸，成做二方。亦俱刻款，做青绿颜色。”[3]其中详细记述内廷发料命苏州制作多件仿古澄泥石渠砚，并还有刻款或作旧色等。此后，内廷造办处命将山西澄泥原料发往苏州，其数量增加为十八块，仍有成做各式澄泥砚。如乾隆四十三年十月行文记载：“交澄泥十八块（巴彦三进），传旨：着交苏州织造舒文随意成做澄泥砚送来，不要俗气。”[4]从中可知，澄泥原料仍是来自山西巡抚巴彦（延）三呈进，并交由苏州成做各式澄泥砚。

至今，澄泥石渠砚仍有数件传世，现藏故宫博物院。其中有二件砚表面有明显的做旧绿色锈迹与档案记载的做旧砚相符，即应是有所本的仿古砚形式。

1 同 177 页注 1，第 42 册，第 513 页。
2 同 177 页注 1，第 38 册，第 807 页。
3 同 177 页注 1，第 40 册，第 228 页。
4 同 177 页注 1，第 41 册，第 415 页。



图 7 清乾隆 御铭各式仿古澄泥砚

## （二）加用宜兴澄泥制作

### 1. 成套（六式）仿古澄泥砚

澄泥砚除内廷造办处所制外，大部分是交地方或苏州承办制作。特别是还有以六方成套制作的形式，并有大、中、小号之分，分别命名为：仿汉石渠阁瓦砚、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天成风字砚、仿宋德寿殿犀纹砚，即是有所本的仿制，如仿自明代高濂《砚谱》等。其中有些是按照“加用三成宜兴澄泥之法”混合制作。据乾隆四十四年七月记事录记载：“澄泥砚二方，加用宜兴澄泥三成烧造砚二方……其澄泥砚交苏州全德，将所传做之澄泥砚，俱照加宜兴澄泥三成之法烧造澄泥砚，其未用玉字三块，交如意馆收贮。”[1] 详细记述了命苏州加用宜兴澄泥烧造的情况。此后，陆续有发料交苏州制作成套各式澄泥砚，并陆续完成分别呈进。如乾隆四十五年十月行文记载：“交澄泥砚十八块，传旨：着发往苏州交全德，照先做过六方一份玉兔朝元砚，大号成做几分、小号成做几分，足做几分做几分。”[2] 记述了内廷造办处将澄泥原料发往苏州照样制作成套澄泥砚（六方）的情况。不仅如此，乾隆四十七年行文记载：“交澄泥二十七块，传旨：着发往苏州成做澄泥砚，足做几分做几分送来。”[3] 直至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分别以大小两份为定数呈进，并陈设各处行宫等。由此可知，乾隆时期各式仿古澄泥砚的制作数量较为可观。

直至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以后，因发往苏州的山西澄泥原料所剩无存，随命不再成做澄泥砚。如乾隆五十五年三月记载：“苏州陆续成做澄泥砚现回澄泥无存，亦声明前来等情，交太监鄂鲁里呈览，奉旨：澄泥砚交泉林中水行宫各一份……澄泥砚嗣后不必成做。”[4] 即自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以后，因山西澄泥原料停止进贡，内廷发往苏州的澄泥原料所剩无存，苏州不再成做各式仿古澄泥砚。〔图 7〕

### 2. 仿古澄泥虎符砚

乾隆仿古澄泥虎伏砚也是交苏州按内廷发样制作。一般是由内廷画样或发木样，与澄泥原料一并发往苏州。如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行文记载：“传旨：虎砚头项不好看，着拨蜡样，呈览，准时向乾清宫要澄泥四块，发往苏州合做虎砚二方……奉旨：着照蜡样成做木样，呈览，准时并作样虎砚连匣，俱苏州照样成做砚两方……奉旨：着交苏州照样成做，其颜色务必与原样一样，得时不必刻字，钦此。于四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将苏州送到澄泥虎砚二方，随木盒，呈进讫。”[5] 其中详尽记述了苏州合作澄泥虎砚的情况。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以后，命苏州所制澄泥砚，俱照加宜兴澄泥三成之法烧造。此后，陆续有发料交由苏州制作澄泥虎符砚。如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记事录记载：“将苏州送到……澄泥虎符砚四方，随紫檀木砚盒四件、做样虎符砚一方，

1 同 177 页注 1，第 42 册，第 513 页。
2 同 177 页注 1，第 44 册，第 18 页。
3 同 177 页注 1，第 45 册，第 411 页。
4 同 177 页注 1，第 52 册，第 324 页。
5 同 177 页注 1，第 39 册，第 522 页。




**图 8　乾隆御用澄泥虎符砚**

澄泥砚交长春园一方、三山各一方、做样澄泥砚交文渊阁。”[1] 其中记述以文渊阁陈设的澄泥虎符砚为样式发往苏州照样制作澄泥虎符砚四方，新做砚分别陈设于长春园、三山等处。

此后，苏州仍有澄泥虎符砚的制作，分别于乾隆五十三年、五十四年陆续完成并呈进，其数量多达 14 方。如乾隆五十三年三月行文记载：“交澄泥虎符砚一方（系玉玲珑馆随安室），传旨：发往苏州，如有余剩澄泥照样承做几方，送来。”[2] 其中记述有按照内廷随安室陈设的澄泥虎符砚为样制作。正如造办处活计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苏州送到虎符砚二方，做样砚一方，呈进交懋勤殿，带往热河、盘山、香山、万寿山、瀛台等地各若干方[3]。由此可知，澄泥虎符砚大部分是交由苏州按内廷样式制作，仅乾隆五十三年、五十四年间，陆续有多次制作并呈进，分别陈设于香山、万寿山、瀛台、盘山、热河、安园、杭州府等各地行宫，成为乾隆时期重要的御用砚形式。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后，也因内廷发往苏州的澄泥原料所剩无存，随命苏州不再成做。至今澄泥虎符砚仍有传世品，现藏故宫博物院〔图 8〕。

## 结语

综上所述，乾隆时期仿古砚的制作形式多样，大致概括有三种情况：一是新制仿古砚，并烧古或作旧等。即是有所本的画样仿制，如有仿照宋苏轼《砚谱》以及仿明高濂砚《谱画》样制作，又有仿宋元文人用砚的形式，或假托名人款等。特别是成套制作的仿古六式砚，不仅造型仿古，命名也仿古，如有以仿汉、仿唐、仿宋砚命名，并形成内廷定式。其材质不拘限于一种，如端石、歙石、紫石、澄泥砚各式仿古砚均有制作，成为乾隆时期御用砚的重要形式，陈设于内廷斋室或各处行宫，或鉴赏收藏于乾清宫入古上等，或用于赏赐等用途。二是按照内廷旧藏砚品仿造，或经过改造，也有或烧古做旧的仿古砚形式，如仿古瓦砚、仿旧藏石砚等，即有些砚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面貌，如为镌刻御题砚铭，将原本砚铭或款识磨去改做，但仍以古砚命名，或以宋砚相称。三是仿古各式澄泥砚的制作，除内廷砚作外，还有发澄泥原料交苏州织造承办制作，并烧古或做旧等，如仿古石渠砚、虎符砚、各式澄泥砚等。特别是乾隆四十年以后直至乾隆晚期，苏州有大量仿古澄泥砚

1　同 177 页注 1，第 44 册，第 640 页。
2　同 177 页注 1，第 50 册，第 588 页。
3　同 177 页注 1，第 52 册，第 324 页。

的制作，其中还有命按照“加用三成宜兴澄泥之法”混合制成，也可谓是乾隆时期澄泥砚原料的创新形式。

此外，有些仿古砚是交苏州配匣或刻款等，也有些御题诗文或砚铭是由内廷懋勤殿镌刻。如镌刻“乾隆御用”、“乾隆御玩”、“大清乾隆仿古”、“宣和御用”款等，均成为御笔临池用砚。至今，这些仿古砚仍有大量传世，其中还有些尚未镌刻题名的半成品，或因不合用被搁置的次品，并有署名巡抚官员“臣徵瑞恭进”款的成套六式仿古澄泥砚形式，再现了乾隆时期仿古砚的基本风貌，为后人了解和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乾隆时期仿古砚的制作形式多样，其大部分是有所本的画样仿制，很少有创新的形式。即可谓“师古”、“仿古”。其砚品形式上溯汉唐，下至宋元，均以模仿承袭。有些仿古砚形式统一，或同出一范。如成套制作的六式仿古澄泥砚，可谓是集锦博古砚形式，均按照高濂《砚谱》画样制作，并形成内廷规制。其表现形式或大或小，或将御题诗文镌刻于砚，其内容既有品评鉴赏，又有引经据典或加以考证，或以砚纪事，昭示后人。作为砚铭，即赋予砚丰富的文化内涵，又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但仍具有一定的程式化，拘泥于大同，缺少创新，甚至有很多重复雷同的样式，其数量也较为可观。而这种墨守成规，无疑也使传统的用砚文化在宫廷得以传承。特别是仿古砚的古朴形制，深得乾隆皇帝的青睐，也契合了乾隆皇帝本人的艺术欣赏品位。正如其评述古物所说：“盖古之物朴于今，今之物华于古。”

正是如此，仿古砚的制作自乾隆初期至晚期，一直沿袭制作，从未间断，既丰富了内府的收藏，又成为乾隆时期特有的御用砚形式。从不同的侧面还可窥见乾隆皇帝本人泽古怡情，视笔砚精良为人生之乐的文人情怀，以及作为一个帝王虚荣甚至有些炫耀的心理。同时，从乾隆晚期十余年仿古澄泥砚的制作还可以看出，宫廷对原料以及加工技术的垄断，并招募地方优秀的能工巧匠供奉内廷，不惜耗费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以至于既加重了地方的经济负担，又使宫中长期积累了大量的各种仿古做旧石砚，从而导致这种特殊砚石的制作很难持续，乾隆帝晚年已下令不再入贡石料，到嘉道时期便自然衰落了。

乾隆时期传世的仿古砚仍有以唐、宋砚相称，尚存质疑，有待进一步探讨和重新认定其时代，虽然有些旧砚已失去本来面貌，但仍不失其艺术价值，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乾隆时期宫廷藏砚以及砚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